

# 唐宋时期地理总志中的道里数据与方向描述研究

顾哲铭

**提 要：**唐宋时期地理总志开辟了“四至八到”的体例，具体形式虽有不同，但其基本格式均可分解为两部分，即道里数据和方向描述。研究表明，唐宋时期地理总志（以《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为代表）的道里数据和方向描述均受到测量路线的决定性影响。由于道里数据的准确性难以评估，通过道里数据来反推交通路线的方法存在严重逻辑漏洞；方向描述反映的是测量路线尤其是路线起始段的实际走向，并非传统意义上理解的两地的相对方位关系。

**关键词：**唐宋时期 地理总志 道里数据 方向描述

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复原交通路线的方法是通过文献检索确定该路线上的地点诸如驿站、关隘、津渡和亭障等，进而连点成线<sup>①</sup>，定位点越密集，结果可信度越高。然而针对文献较为缺乏的地区，交通路线的复原工作就很难采用上述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例如中古时期边疆地区，许多羁縻政区甚至只有寥寥数条“四至八到”信息，这使得一些研究者转而利用地理总志中的道路里程来反推交通路线<sup>②</sup>，与传统上先定点、后连线的研究方法恰好相反。

利用道路里程反推交通路线的研究方式成立的前提是对地理总志中道里数据和方向描述这两大核心信息的正确解读。通过对地理学史的梳理和相关的案例式研究，历史地理学界已经基本确定了“四至八到”反映的是相邻州县之间实际交通路线的结论<sup>③</sup>，但是由于缺乏对唐宋时期地理总志文本的系统性研究，学界对于道里数据和方向描述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和不足。本文在充分评述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相关唐宋地理总志道里数据与宋代洪迈和唐代圆仁的实测道里数据的对比和评估，提出对道里数据的再思考；通过对《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方向描述的系统性分析并结合明清方志材料，给出对方向描述的新理解。

## 一 对道里数据的再思考

地理总志中的道里数据是唐宋时期罕见的定量描述记录，也是最受研究者关注的部分。目前影响较大的“道里数据—交通路线—地理定点”研究方式以郭声波对“河曲十六州”的地望考证最具代表性。在比对《通典·州郡典》《旧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图志》存在差异的道里数据的基础上，郭声波采取“数值存在不同取整情况”和“可能存在错字”作为数据筛选

①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② 参见罗凯：《唐代山州地望与性质考——兼论岭南附贡州的建置》，《历史地理》2012年第26辑；曹家齐：《官路、私路与驿路、县路——宋代州（府）县城周围道路格局新探》，《学术研究》2012年第7期；史志林：《关于唐会州州治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1期；郭声波、李培生：《北宋茂属十七羁縻州地望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3期。

③ 参见曹家齐：《唐宋地志所记“四至八到”为道路里程考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4期；成一农：《“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梁晓玲：《疆理天下：中国传统地学视域中“四至八到”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的依据。<sup>①</sup> 考虑到局部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问题导向,这一数据处理方式本无可厚非,然而在检索和筛选地理总志的道里数据之前,首先应当对数据集本身的准确性做出评估。

### (一) 道里数据低准确性案例——以洪迈《容斋随笔》为中心

地理志和地理总志的道里数据的是否具有准确性,长期以来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提出的质疑:

古今舆地图志所记某州至某州若干里,多有差误。偶阅《元祐九域志》<sup>②</sup>,姑以吾乡饶州证之。饶西至洪州三百八十里,而《志》云:“西至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洪五百六十八里。”于洪州书至饶,又衍二十里,是为七百六十里也。饶至信州三百七十里,而《志》云:“东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信州三百五十里。”是为六百四十里也。饶至池州四百八十里,而《志》云:“北至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三百八十里。”是为五百七十里也。<sup>③</sup>

仔细对照《元丰九域志》,洪迈此说细节上有待商榷。首先,洪迈所引饶州条文本“西至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洪州五百六十八里”之后还有一条记述“西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里,自界首至洪州二百一十里”<sup>④</sup>,两段距离相加为370里。在洪州条下还有“东北至本州界二百七十里,自界首至饶州一百七十里”<sup>⑤</sup>,两段距离相加为440里。其次,洪迈所引饶州条文本“东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信州三百五十里”,金陵书局本《元丰九域志》信州条作“西北至本州界二百五十里,自界首至饶州二百九十里”<sup>⑥</sup>,之前还有一条记述“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饶州一百八十里”<sup>⑦</sup>,两段距离相加为300里。

由于饶、洪、信、池四州在两宋时期治所和边界均无变动,因此我们可将南宋初洪迈实测数据与北宋末《元丰九域志》数据及北宋初《太平寰宇记》数据<sup>⑧</sup>对比制成表1。

表1 洪迈实测、《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道里数据对照表

条目	洪迈实测	《元丰九域志》	《太平寰宇记》
饶州—洪州	380	738*/758*/370/440	440
饶州—信州	370	640*/300/540	500
饶州—池州	480	570*	580

说明:表中数据单位为“里”,标有\*的数据为洪迈所引

① 参见郭声波:《“河曲十六州”交通与地望考——唐贞观十三年政区考辨之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

② 《元祐九域志》即《元丰九域志》,因其正式颁行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

③ 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续笔》卷10《舆地道里误》,中华书局,2005年,第346—347页。

④ 王存撰,王文楚等点校:《元丰九域志》卷6《江南路荆湖路》,中华书局,2005年,第245页。

⑤ 王存撰,王文楚等点校:《元丰九域志》卷6《江南路荆湖路》,第249页。

⑥ 金陵书局本此条作“二百五十里”,洪迈所见“三百五十里”为浙本。参见王存撰,王文楚等点校:《元丰九域志》卷6《江南路荆湖路》,第246—281页。

⑦ 王存撰,王文楚等点校:《元丰九域志》卷6《江南路荆湖路》,第246页。

⑧ 参见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05《江南西道三》、卷107《江南西道五》,中华书局,2007年,第2084—2090、第2133—2160页。

“饶州—洪州”“饶州—信州”两处道里数据在《元丰九域志》各有4个和3个数据，不知为何洪迈分别选择了与实测结果相差最大的738里和640里作为论据，如果取370里和300里，误差就小得多。蓝勇认为“地近易核，作为饶州人的洪迈对其家乡的里程是最有发言权的，《元丰九域志》的记载或有误差”<sup>①</sup>。事实上仅仅依据上表中的数据对勘，根本无法判断哪几个数据更为接近饶州与相邻三州的路程距离。

除了《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道里数据准确性低的解释，也有可能是由于饶州附近水网密布的复杂地形，以及《元丰九域志》独创的分段式道里描述，使得上述“州—州”道里数据中可能存在多个正确答案，不同交通路线的选择是主要的影响因素。由于缺乏同一历史时期更多的地理信息，上述两种解释均已无法证伪。

## （二）道里数据高准确性案例——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

中唐时期，日本请益僧圆仁入唐求法，以日记形式记录了在唐土的行程与见闻，举例如下：

（四月）十九日……午时发，西北行廿五里，热气如蒸，到赵州南开元寺宿。（四月）廿日平明……西北行卅里，到镇州鸾[栾]城县。……向西北行三十里，到镇州大廓县界作护驿刘家宿。廿一日早发，正北卅里，到镇州节度府。<sup>②</sup>

利用上述描述性文字，可以估算出赵州城（城南开元寺）—镇州城（节度府）的道里约为 $40 + 30 + 30 = 100$ （里）。

按此方法，我们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行程描述中提取出了有效的道里数据，对于分段数据进行了加和，得到了一系列“州—州”“州—县”的道里数据，圆仁在唐游历时间为唐文宗开成三年至唐武宗会昌六年（838—846），与李吉甫撰写《元和郡县图志》的唐宪宗元和年间（约813年前后）极为接近，全国的地理信息（尤其是交通路线）可以视为基本没有变动。于是可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实测道里数据<sup>③</sup>与《元和郡县图志》相应的道里数据<sup>④</sup>进行对比并制成表2。可以发现圆仁的实测道里数据与《元和志》的道里数据是比较接近的，绝大多数数据的误差都在10%以内。

圆仁的测量方法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亦有提及：“唐国行五里立一候子，行十里立二候子：筑土堆，四角，上狭下阔，高四尺或五尺、六尺不定，曰唤之为里隔柱。”<sup>⑤</sup>候子，传世文献中多写作“墩子”，为唐宋时代记录里程的设施，多为土制，极少为石制。<sup>⑥</sup>所谓“五里单墩，十里双墩”<sup>⑦</sup>，指的是主要驿路两侧的最常见的人造景观，如唐诗有“堆堆路傍墩，一双

① 蓝勇：《对古代交通里程记载的运用要审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

② [日]释圆仁撰，[日]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等修订：《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61—262页。

③ 参见[日]释圆仁撰，[日]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等修订：《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218—374页。

④ 参见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10、11《河南道六、七》，卷17《河北道二》，卷12、13《河东道二、三》，卷2《关内道二》，中华书局，2005年，第257—314、第477—499、第323—384、第25—46页。

⑤ [日]释圆仁撰，[日]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等修订：《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221页。

⑥ 参见周峰：《宋金时期的里墩碑》，《四川文物》2017年第6期。

⑦ 张自烈：《正字通》卷2《土部》，“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经部，第234册，第224页。

复一只”<sup>①</sup>，宋诗也有“墙上浮图路傍堠，送人南北管离愁”<sup>②</sup>。圆仁所记录的里程数字大部分是5或者10的倍数，计算方法实际上就是沿途数堠子。

表2 《元和郡县图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道里数据对照表

政区	路线	《元和郡县图志》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误差
河南道	牟平县—登州	185	200	+8.1%
	登州—莱州	240	230	-4.2%
	北海县—青州	130	110	-15.4%
	青州—临淄县	40	35	+12.5%
河北道	宁晋县—赵州	43	40	+6.9%
	栾城县—赵州	39	40	-2.6%
	赵州—镇州	100	100	0
	镇州—行唐县	65	65	0
河东道	太原府—清源县	39	38	+2.6%
	清源县—文水县	71	65	+8.5%
	文水县—汾州	60	65	-8.3%
	汾州—孝义县	35	35	0
	孝义县—灵石县	85	90	-5.9%
	洪洞县—晋州	60	60	0
	宝鼎—河中府	110	105	+4.5%
关内道	朝邑县—同州	35	35	0

本质上，《元和郡县图志》的道里数据来自各州上交兵部的图经<sup>③</sup>，而各州图经的道里数据又来自地方政府对于实际道路的测量，即“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候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贰及四夷之归化者，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与版籍偕上省”，所以《元和郡县图志》的道里数据源自于相关人员行走实测，正常情况下会选择待测地之间立有里堠的主要驿路，测量方法应当也是以数堠子为主。

河北道的“镇州—赵州”段位于沿太行山东麓的交通要道上，是洛阳通往燕云的最主要大道；河东道和关内道的“太原府—汾州—晋州—河中府—同州”段是从太原沿汾河谷地南下，西渡黄河沿渭水北岸前往长安主要且唯一的路线；河南道的“登州—莱州—青州”段处于山东半岛沿海道路上，是半岛北部的交通要道。同样都走交通主干道，圆仁选择的路线和唐代测量人员所选择的路线是基本一致的，因此重复测量的误差比较小。

实际上，各地理总志中都有一些相邻两州之间道里数据不一致的情况，如果误差较小，体现

① 韩愈著，严昌校点：《韩愈集》卷6，岳麓书社，2000年，第80页。

② 范成大著，周汝昌选注：《范成大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③ 参见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中华书局，2014年，第162页。

的正是同一条路线的测量、统计误差；如果误差较大，排除文本讹误导致的差异，目前只能用测量路线不同来解释。这些不一致究竟反映的是同一条路线的不同测量结果抑或是不同测量路线的存在，受限于史料，很难做出判断。

### （三）以道里数据反推交通路线的逻辑漏洞

洪迈的质疑指出了道里数据的低准确性，圆仁的记录则说明了道里数据的高准确性。结合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案例可以发现，即便排除文本传抄过程中的讹误，道里数据的准确性还是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不同交通路线的选择是决定性的。基于常识，测量过程中的偶然误差也难以避免，古代道里测量工作自然不会采取多次测量取平均值的方式来减小偶然误差，统计地方数据的上级部门在取舍存在差异的各地数据时也会产生统计过程中的误差。此外，作为唐宋地理总志道里数据可比性的基础，唐里与宋里的单位长度差异以及其相对于公里的折算比率至今都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较为权威的说法为：胡戟认为1唐大尺约等于29.5厘米<sup>①</sup>，吴慧认为1宋尺约等于31.2厘米<sup>②</sup>，由此可得1唐大里约为531米，1宋里约为562米，此项差异会在中长距离尺度的研究中显著地放大影响。以上诸多因素综合，使得道里数据应用于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站在古人的角度上，人们很自然地正向思考，交通路线决定了道里数据；站在今人的角度上，我们被迫逆向思考，只能通过道里数据来揣测交通路线。然而，两个方向的思维并不互为充分必要条件。对于一条确定的交通路线，只对应唯一的道里数据；相反对于一个道里数据，可能对应着数量大于等于一条的交通路线，因此，从道里数据反推交通路线的逻辑基础本身就是不牢靠的，再加上道里数据的准确性难以评估，所谓的复原工作实际上处于一种不可避免的尴尬境地。

## 二 对方向描述的新理解

方向描述是地理信息的另外一大组成部分，即唐宋地志中“四至八到”所采用的“四正四隅”方向体系。汪前进指出《元和郡县图志》中除“四正四隅”外还使用了8个“正向微偏”的方向，总共有16个方向。<sup>③</sup>这一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正向微偏”只能理解为是一种特殊的方向描述文本表达方式，《元和郡县图志》中使用“正向微偏”的条目，在《太平寰宇记》中大多数被修正为“四正四隅”形式。此外，《太平寰宇记》洺州条有“（洺州）直北落西至邢州九十里”<sup>④</sup>，由于“正北微西”和“直北落西”均无进行区分的具体标准，如果“正北微西”算作独立的方向，那“直北落西”也须作同样处理。由此观之，“正向微偏”看似提升了方向描述的精确度，但是由于并未给出“微”的具体比例，没有作为独立方向的实际应用价值，应当视同相应的“正向”。

### （一）对于相邻两州方向描述不能对应问题的解释

在排除了“正向微偏”表述带来的干扰之后，唐宋地志中还是存在相邻两州之间方向描述不能对应的情况，即存在不属于“东—西”“南—北”“东南—西北”“西南—东北”四大对应方向范畴的方向描述，长期以来缺乏合理的解释。

唐宋时期的4部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通典·州郡典》《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

① 参见胡戟：《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

② 参见吴慧：《宋元的度量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③ 参见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④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58《河北道七》，第1191页。

志》)方向描述的文本形式各有差异。《州郡典》的大部分文本形式是“(方向)到某州(某县)界若干里”;《元丰九域志》在此基础上又有改进,形成了独特的“(方向)至本州界若干里,自界首至某州若干里”的表述方式。由于唐宋时代的政区边界难以精确复原,利用“点—边界”和“点—边界—点”这两类表述方式很难推测具体的测量路线。《元和郡县图志》与《太平寰宇记》的文本形式则较为相似,均为“(方向)至某州若干里”,由于唐宋时代的统县政区以及县级政区的具体定点还是比较明确的,这种“点—点”的表述方式便于依据地形情况大致勾勒出测量路线。因此笔者选取《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作为研究对象,对所有条目的方向描述进行系统性搜索和比对,最终发现了8处相邻“州—州”方向描述不能对应的情况<sup>①</sup>(参见表3)。

表3 《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相邻两州方向不能对应情况汇总表

条目	《元和郡县图志》	《太平寰宇记》
鄜州—延州	北至延州一百五十里 西至鄜州一百五十里 <sup>②</sup>	北至延州一百五十里 西南到鄜州一百三十里 <sup>③</sup>
天德军—西受降城	西至西受降城一百八十里 正东微南至天德军一百八十里 <sup>④</sup>	西至西受降城一百八十里 正东微南至天德军一百八十里 <sup>⑤</sup>
滑州—卫州	正南微西至卫州一百五十里 东渡河至滑州一百一十五里 <sup>⑥</sup>	西至卫州一百一十六里,北至卫州 一百六十五里,西北至卫州一百三 十二里 东至滑州一百三十三里 <sup>⑦</sup>
青州—密州	东至密州三百三十里 西北至青州三百三十里 <sup>⑧</sup>	东至密州三百三十里 北至青州三百三十里,西北至青州 同上 <sup>⑨</sup>

① 无法明确是否属于相邻两州之间方向不能对应的案例暂不列入,例如《元和志》:(魏州)东北至贝州二百一十里,(贝州)南至魏州二百一十里,方向不对应;《寰宇记》:(魏州)北至贝州二百一十里,(贝州)南至魏州二百一十二里,方向对应,有可能是《元和志》衍字,也有可能是“东北”与“北”两方向被模糊化了。参见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54《河北道三》,第1104—1116页;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58《河北道七》,第1197—1203页。

②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3《关内道三》,第69—72、第75—79页。

③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35、36《关西道十一、十二》,第735—739、第752—758页。

④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第113—117页。

⑤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39《关西道十五》,第828—831页。

⑥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8《河南道四》、卷16《河北道一》,第197—201、第458—463页。

⑦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9《河南道九》、卷56《河北道五》,第159—164、第1150—1159页。

⑧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10《河南道六》、卷11《河南道七》,第271—276、第297—301页。

⑨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8《河南道十八》、卷24《河南道二十四》,第349—361、第492—505页。

(续表)

条目	《元和郡县图志》	《太平寰宇记》
岚州—代州	东北至代州三百里 北至岚州三百里 <sup>①</sup>	东北至代州三百里 西至岚州界一百六十里 <sup>②</sup>
彭州—茂州	西北取灌口路至茂州三百七十里 南至彭州三百七十里 <sup>③</sup>	西北取灌口路至茂州三百七十里 南至彭州三百里 <sup>④</sup>
潭州—袁州	东南至袁州五百二十五里 西至潭州五百二十六里 <sup>⑤</sup>	东南至袁州屈曲五百二十六里 西至潭州五百二十六里 <sup>⑥</sup>
处州—建州	西北至建州水路九百里，陆路四百九十里 东北至处州水路九百里 <sup>⑦</sup>	西北至建州浦城县七百四十五里 东至处州九百七十六里 <sup>⑧</sup>

上述案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处州—建州”条：

条目	《元和郡县图志》	《太平寰宇记》
处州	西北至建州水路九百里，陆路四百九十里	西北至建州浦城县七百四十五里
建州	东北至处州水路九百里	东至处州九百七十六里

《元和郡县图志》处州条据孙星衍考证“（西北）官本作东南，此误”。贺次君按对此提出异议：“唐处州在今浙江丽水县，建州即今福建建瓯县，位处州西南，西北故误，东南亦未是。”<sup>⑨</sup>《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处州”条完全一致的方向描述使得版本层面的文字错讹站不住脚，地理意义上“处州—建州”毫无疑问的“东北—西南”方位关系使得校勘者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会采用“（处州）西北至建州”这一南辕北辙的方向描述。

①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14《河东道三》，第395—397、第401—404页。

②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41《河东道二》、卷49《河东道十》，第871—876、第1024—1031页。

③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31《剑南道上》，第772—775、第811—813页。

④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73《剑南西道二》、卷78《剑南西道七》，第1484—1487、第1572—1576页。

⑤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28《江南道四》、卷29《江南道五》，第677—678、第701—704页。

⑥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09《江南西道七》、卷114《江南西道十二》，第2194—2204、第2315—2324页。

⑦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26《江南道二》、卷29《江南道五》，第623—625、第718—719页。

⑧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99《江南西道十一》、卷101《江南西道十三》，第1981—1984、第2010—2017页。

⑨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26《江南道二》校勘记68，第637页。

唐宋处州城今已不存，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经历了大规模重修，明清处州城又在元代的基础上不断修葺<sup>①</sup>，如今我们只能依据明清城门的位置来倒推唐宋处州城的大致位置（今丽水市莲都区南）。据方志记载，处州府城六门，北为望京门（丽阳门），东为迎春门（岩泉门、火烧门），东南为行春门（下河门），南为南明门（春风门、大水门），西南为括苍门（洛川门、小水门），东为通惠门（左渠门）<sup>②</sup>，其中南明门、行春门尚存，括苍门今不存，但遗址处立有纪念碑，凭此三门位置可大致确定明清处州城南廓的大小和位置，唐宋时期的处州州治与明清时相隔不远且均紧靠大溪。

瓯江支流大溪在流经北岸处州城处由东南流向转为东北流向。从城南出城下水，起始段水路方向很明确是向西北，由此逆大溪进入龙泉溪前往龙泉县，再由龙泉县翻越山岭西行至建州浦城县，最后由浦城县顺南浦溪而下向西南至建州城。因此，《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所记载的“（处州）西北至建州”的“西北”，是测量路线起始段的方向（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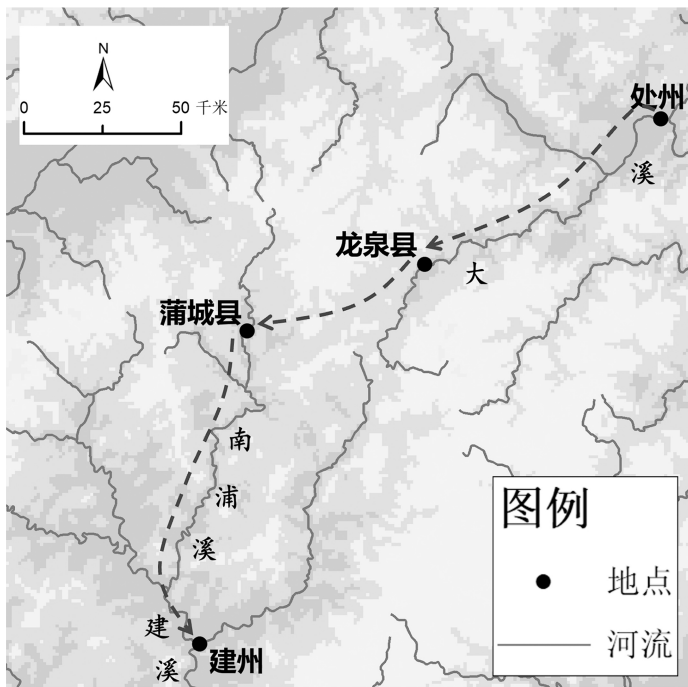


图1 “处州—建州”段测量路线图附处州城南廓示意图

说明：笔者自绘，底图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CHGIS (v4.0) DEM 数字地形图

此外，《元和郡县志》建州条据贺次君按，各本“水路”均误作“山路”<sup>③</sup>。实际上处州至建州的干道是瓯江、闽江水路为主兼有山路，由于瓯江上游支流龙泉溪与闽江上游支流南浦溪没有交汇，从龙泉县到浦城县还是要翻越横亘其间的山脉，因此无论是“水路”“山路”都算正确。

① 赵治中：《处州城州治“三徙”考辨》，《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

② 参见康熙《处州府志》卷1《輿地志》，“复旦大学图书馆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20册，第201—205页。

③ 参见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五》校勘记92，第732页。



## (二) 对于方向描述与实际方位关系不相符问题的解释

除了相邻两州之间方向描述不能对应,方向描述与实际方位关系不相符的情况在唐宋地志中也经常出现。对于此类问题传统解决方式还是多文本对勘,然而当各文本完全一致时,秉持常规思路的研究者们就显得束手无策,往往只能依据历史地图给出一两句含糊其辞的理校。

此处以受自然地理条件制约最显著的“灵州—凉州”条的方向描述<sup>①</sup>为例,解释方向描述与实际方位关系不相符问题的原因。

条目	《元和郡县图志》	《太平寰宇记》
灵州	西南至凉州九百里	西南至凉州九百里

孙星衍认为“西南”宜作“西北”,贺次君亦采纳此说。<sup>②</sup>实际上,灵州(今宁夏灵武县)与凉州(今甘肃武威市)的纬度基本一致,灵州纬度略高于 $38^{\circ}\text{N}$ ,而凉州的纬度略低于 $38^{\circ}\text{N}$ ,即使按照地理学上方位关系来解释,凉州也是位于灵州正西或西南而非西北,且《太平寰宇记》沿用《元和郡县图志》表述也说明“西南”这一方向描述并不存在文本错讹现象。

唐宋时代灵州至凉州的路线分为南北两条(参见图2)。南线由“灵州—会州”段和“会州—凉州”段组合而成。“灵州—会州”段完全沿黄河河谷前进,具体为:由灵州向西南至清水河与黄河交汇处(今宁夏中宁县)渡过清水河,再沿黄河南岸向西行至会宁关、乌兰关一带(今甘肃靖远县双龙乡)<sup>③</sup>进入会州辖境,此路线是秦汉以来游牧于蒙古高原的民族向南迁徙、侵扰的主要路线,4世纪鲜卑吐谷浑部、唐代突厥进入河湟谷地正是取道此路。<sup>④</sup>“会州—凉州”段则利用长安至凉州的陇右北道路线,具体为:从会宁关、乌兰关一带渡过黄河,西经新泉军(今甘肃靖远县黄河以北)<sup>⑤</sup>向西北至凉州。<sup>⑥</sup>北线即灵州道西段起始部分,是晚唐五代宋初中原与西域朝贡、贸易往来通道<sup>⑦</sup>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路线为:出灵州渡黄河后向西北行,翻越贺兰山口后,穿过腾格里沙漠进入民勤绿洲,然后循石羊河谷向西南至凉州(参见图2)。<sup>⑧</sup>后晋天福三年(938)高居海出使于阗<sup>⑨</sup>,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王延德出使西州回鹘<sup>⑩</sup>采用

① 参见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西道四》,第91—92页;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36《关西道十二》,第759—768页。

② 参见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西道四》校勘记8,第118页。

③ 会宁关、乌兰关的确切位置暂无定论,可以确定的是两关同在今靖远县双龙乡。参见刘满:《西北黄河古渡考(二)》,《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李并成:《唐代会宁关及其相关问题考》,《历史地理》2016年第34期;史志林、沈渭显:《唐会宁关位置辨析》,《历史地理》2015年第31辑;冯培红、王蕾:《中古时期乌兰关、县位置考辨》,《敦煌研究》2017年第2期。

④ 参见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13页。

⑤ 参见李宗俊:《唐前期河西节度三军考述》,《历史地理》2007年第22辑。

⑥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2《河陇碛西区》,第418—419页。

⑦ 参见赵贞:《敦煌文书中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

⑧ 乐玲、张萍:《GIS技术支持下的北宋初期丝路要道灵州道复原研究》,《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⑨ 参见高居海撰:《使于阗记》,“西北史地文献”第三辑,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106册,第271—274页。

⑩ 参见王延德撰:《西域使程记》,《宋史》卷490《外国六》,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40册,第14110—14118页。

的都是北线。两线相比较可以发现，北线行程较短，需穿越腾格里沙漠，沿途罕见聚落；南线行程较长，多沿河谷、盆地行进，沿途存在小型城镇。中唐时代测量人员选用的是南线，整条路线先向西南再转向西北，西南段和西北段直线距离大致为1:1，“西南”表述的正是南线前半段“灵州—会州”段测量路线的行进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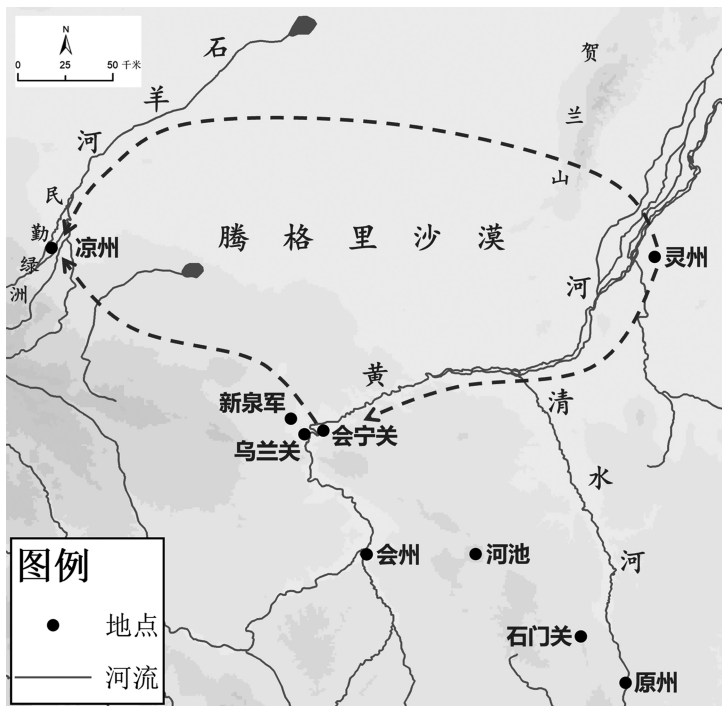


图2 “灵州—凉州”段测量路线图

说明：笔者自绘，底图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CHGIS (v4.0) DEM 数字地形图

### (三) 对于唐宋时期地理总志方向描述的正确解释

不管是相邻两州之间方向描述不能对应还是方向描述与实际方位关系不相符，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原因即唐宋地志中的方向描述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两地的相对位置，而是两地之间交通路线的实际走向，尤其是起始段的实际走向。之所以大部分地区的方向描述不存在上述两种问题，是因为绝大多数相邻州、县之间的交通路线里程较短也没有非常复杂的方向变化，起始段方向与整体路线的走势基本一致，所以起始段的方向描述约等于整条路线的方向描述，也可近似看作两地之间的相对方位关系。

从唐宋地志到明清方志相邻统县政区的方向描述变化中，可以发现方向描述存在着准确化发展趋势，以上文所论述“处州—建州”为例，汇总唐宋地志和明代方志相关方向描述制成表4。

表4 唐宋地志和明代方志所载“处州—建州”方向描述汇总表

志书	方向描述
《元和郡县图志》	(处州) 西北至建州水路九百里，陆路四百九十里 (建州) 东北至处州水路九百里

(续表)

志书	方向描述
《太平寰宇记》	(处州) 西北至建州浦城县七百四十五里 (建州) 东至处州九百七十六里
《元丰九域志》	(处州) 西南至本州界六百二十里, 自界首至建州二百里 <sup>①</sup> (建州) 东至本州界一百六十里, 自界首至处州六百二十里 <sup>②</sup>
成化《处州府志》	(处州) 西南到福建建宁府八百二十里 <sup>③</sup>
嘉靖《建宁府志》	(建州) 东北到浙江处州府龙泉县界二百二十五里 <sup>④</sup>

说明: 清代《处州府志》《建宁府志》所载方向描述与明代同, 此处省略

对于古典意义上的“四正四隅”方向进行描述, 并不需要现代地理测绘技术, 只需要整体把握测量路线即可。从唐宋至明代, 志书对于处州到建州的方向描述从“西北”转变为“西南”, 建州到处州的方向描述从“东北”“东”混用固定为“东北”, 方向描述从错误走向准确的过程实质体现了测量人员对于测量路线的认识从局部走向整体。这同时反映出随着人口南迁与土地开发, 相关地区的居民对于交通路线的整体认识水平有着显著提高。

## 结 论

唐宋时期地理总志中的核心信息“四至八到”本质上是由道里数据和方向描述两部分组成。以道里数据反推交通路线的方法存在的风险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此外学界对于方向描述的理解和地理总志所表达的含义也存在一定的偏差。

研究结论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 以《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为代表的唐宋地理总志道里数据和方向描述均受到测量路线的决定性影响。第二, 受制于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 道里数据的准确性高低难以评估, 唐宋地志中相邻州之间道里数据不一致受到不同交通路线的选择, 测量、统计过程中的误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通过道里数据来反推交通路线的方法也存在严重的逻辑漏洞。第三, 方向描述反映的是交通路线的实际走向, 尤其是路线起始段的实际走向, 并非传统意义上理解的两地的相对方位关系。由此可以解释唐宋地志中对于相邻两州方向描述不能对应问题和方向描述与实际方位关系不相符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 唐宋地志聚焦局部交通路线的方向描述逐渐被明清方志中覆盖整体交通路线的方向描述所取代。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 程方勇

① 王存撰, 王文楚等点校: 《元丰九域志》卷5《淮南路两浙路》, 第217页。

② 王存撰, 王文楚等点校: 《元丰九域志》卷9《福建路广南路》, 第401页。

③ 成化《处州府志》卷1《疆域》,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3辑·史部,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第21册, 第87—89页。

④ 嘉靖《建宁府志》卷2《疆域》,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上海古籍书店, 1981年, 第27册, 第65—66页。